



○ 顾毓琇(邓叔群院士的清华学堂级友)纪念邓叔群题词

今年(2009年)4月据美国媒体报道,康奈尔大学将流落海外70年的珍稀真菌交还中国,并特别提到1923年,中国学者邓叔群旅行半个地球,前来康奈尔大学研究真菌学。5年后,他带着丰富的真菌学知识返国,其后10年骑马走遍中国各地,在森林、田地和沼泽中搜寻各种霉菌、酵母菌、地衣、茄属植物等。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邓叔群安排把他辛苦搜集的真菌移出南京的植物研究所,以免遭战火摧残,其中2278个真菌包几经辗转运到邓叔群的母校康奈尔大学保存。邓叔群《中国的真菌》一书曾经仔细记下了他的真菌发现。康奈尔大学举行正式仪式,把稀有虎皮香菇(又称豹斑革耳, *Lentinus tigrinus*)归还给中国一个高级代表团。该大学校长大卫·斯科尔顿(David Skorton)重申,康奈尔愿与科学界分享这批自1940年以来即由该校“为全球科学界珍藏的真菌(fungi)”,大约1700种真菌将移交给中国,包括57种被视为“无可取代”的菌种。邓伯伯如地下有知一定十分欣慰。但愿中国能够保管好这些真菌,真正促进对真菌的研究利用。

几位中国生物学界的前辈

在中关村三座楼里还住有几位生物学的前辈,有植物学的前辈钱崇澍、

陈焕镛、林镛和秦仁昌，昆虫学家陈世骧和谢蕴真夫妇。作为一个晚辈，我愿把我所知道的作些简单介绍。

钱崇澍先生与胡先骕先生等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主要奠基人。胡先骕先生因“政治”问题在解放后就不再被提及和重用。而钱先生是学者型，因而在1950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53年前为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直至到1965年12月28日于北京去世。

钱先生于1883年11月11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1910年赴美，先后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先学农学，后改学植物学，最后攻读植物生理学和生态学，获植物学学士学位。1916年回国，他在中国学术界做了许多组织和领导工作。钱先生在1927~1935年、1937~1942年间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教授兼植物部主任，历任南京甲种农业专科学校、南京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他曾与邹秉文和胡先骕合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植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他是植物学界的长者和老前辈。钱先生呕心沥血，为我国培养了许多植物学人才，真正是“桃李满天下”。我在后面要介绍的另一位前辈、植物分类学家秦仁昌的启蒙老师也是钱崇澍，秦仁昌的毕业论文《南京木本植物》就是在钱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每当秦仁昌谈起这段往事时，对钱崇澍老师充满了崇敬和怀念的心情。

钱崇澍先生曾住在中关村14楼。

陈焕镛先生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晚年移居北京，从事编纂《中国植物志》时也住在中关村14楼。

陈焕镛先生是广东新会人，生于1890年，卒于1971年。陈焕镛1919年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他曾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植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他于1928年创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室，后改名为农林植物研究所，1954年该所改属中国科学院，即为著名的华南植物研究所，陈焕镛一直任所长。他常年工作在中国南方，其足迹遍布海南、粤北、鄂西、广西及香港等地，跋涉于人迹罕

至的深山林区采集植物标本,对中国华南的植物进行大量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发现 100 多个植物新种、10 多个新属;其中为纪念植物学家钟观光而命名的木兰科子遗植物“观光木属”和裸子植物“银杉属”在植物分类上有重大意义。陈焕镛与秉志、钱崇澍等科学家提出建立天然森林禁伐区的建议,为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打下基础。陈焕镛于 1955 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陈焕镛一生寻求“求中国科学之独立,与各友邦并驾齐驱”。他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探求不已。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经济树木》、《中国植物图谱》(共 5 卷)、《海南植物志》(第一、二卷)、《中国植物志》(第二卷、第十一卷)、《银杉——我国特产的松柏类植物》、《中国木兰科新属新种》等。

林镛先生是我国最著名的菊科分类学家。他是江苏丹阳人,1903 年生,1981 年去世。林镛于 1928 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1930 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西南联大、西北农学院、厦门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并任福建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49 年后,林镛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顾问;中国植物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1955 年,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他曾居住在中关村 15 楼。

20 世纪 20 年代,林镛先生主要从事真菌学研究,是中国真菌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30 年代起,他从事高等植物分类学研究,是中国菊科、旋花科和龙胆科植物系统分类的奠基者。50 年代,他参加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编写了《水土保持手册》,为黄河综合治理和黄土区水土保持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他还主持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及《中国植物志》菊科的编写,发现了菊科重羽菊属及各类植物的新分类群百余种,主要著作有《真菌之雌雄异体》、《中国植物志》第 74、75、76(1)和 76(2)卷册、《中国新见或未深悉之菊科植物》等。

林镛先生有四个女儿,由于从小受到父辈的熏陶,其中二人选择了生物学专业。林镛先生的女儿深情地回忆道:父亲的为人是刚直不阿,不会见风



○ 1963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接见农业科学技术的科学家。
逆时针数前排第九为林榕、十为郑万钧、十一刘崇乐、十二蔡邦华、十四秦仁昌(个子特高者)

使舵，也绝不说违心的话。父亲严格地教导她们做人的道理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今天的事今天做，不要等别人！不要等明天！”“不要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随波逐流！”

秦仁昌先生是位植物分类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奠基人。蕨类植物是高等植物中比较原始的一大类群，也是最早的陆生植物。这种植物是生长在山野的草本，有着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遍布于全世界温带和热带。对于蕨类植物的分类系统，由于植物学家意见不一致，过去常把蕨类植物作为1个门，其下5个纲，即松叶蕨纲、石松纲、水韭纲、木贼纲(楔叶纲)、真蕨纲。前4纲都是小叶型蕨类植物，是一些较原始而古老的蕨类植物，现存在较少。真蕨纲是大型叶蕨类，是最进化的蕨类植物，也是现代极其繁茂的蕨类植物。秦仁昌先生则将蕨类植物分成5个亚门，即将上述5个纲均提升为亚门。

家父生前常谈起他的这位好友。他是晚清名将左宗棠之孙女婿，早年

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他身高近2米，是我见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里最高的一位。

秦仁昌先生是江苏武进人，生于1898年，逝于1986年。他于1925年获金陵大学理学士学位，毕生致力于蕨类植物研究。1940年，秦仁昌先生发表《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将占真蕨种数90%的一个十分庞杂的水龙骨科划分为33科、249属，清晰地显示出了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解决了当时蕨类植物学中难度最大的课题，后来被称为“秦仁昌系统”，震动了当时国际蕨类学界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因而获荷属印尼隆福氏生物学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他辗转流亡到云南，又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充分利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有利条件，不畏山高水急、路险人稀，广泛进行蕨类植物调查和采集，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批珍贵的标本为他以后对那些以我国西南山地为分布中心的蹄盖蕨、鳞毛蕨、水龙骨等几个大类群的世界性研究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秦仁昌却在昆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困难在一个强者面前变成了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阶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955年，他当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调任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1959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长，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年轻同志的协助下于当年首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这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为其他卷册的编写树立了一个典范。按计划，《中国植物志》中蕨类植物共五卷（第二至第六卷），到1964年，他已为其他四卷蕨类植物中的近三卷准备了初稿。

我清楚地记得，在“文革”前夕他常来我家，忧心忡忡地谈及他的计划可能受影响，不知道下一步形势会怎样发展。中国的老知识分子被历次政治运动都搞怕了，尽管他们平时说话小心谨慎，一心从业务，但运动一到，历史问题仍会被掀出来，这真是中国老知识分子的悲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他受到了冲击，但对于一贯酷爱自己事业的秦仁昌来

说,他从来没有停止蕨类植物研究工作,仍然密切注意国际植物学最新动态,收集分类学、形态学和细胞学等各方面的有关资料,不断充实和修改自己的分类系统,于1978年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一文,使他的蕨类植物系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系统已为全国植物学界和各标本室所采用,1989年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秦伯伯晚年,夫人先他而去。他和我们同住在黄庄小区,后来他不慎跌断了腿,出不了门,但在家一直从事研究工作直至去世。他有一子一孙,儿媳最初从事脑外科,后成为北医三院著名的乳癌专家。

陈世骧和谢蕴真夫妇是一对昆虫学家。陈世骧,昆虫学家、进化分类学家,毕生从事叶甲科系统分类研究,50年代中后期着力研究进化论与分类学,在60年的科研生涯中,结合其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和实践经验,探讨生物进化的哲学问题,并将其贯穿到研究生物分类的基本问题中,对物种概念、系统原理和特征分析的全面论述,综合为进化分类学的一个理论体系。他主编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鞘翅目铁甲科》,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从1953年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成立起就任所长,后在1962年又任昆虫和动物二所合并后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在1982~1988年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谢蕴真也是法国留学多年的专家,是当时女科学家中学术地位较高的一位。《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一册)鞘翅目天牛科就是由陈世骧谢蕴真夫妇与邓国藩合著。该书记载了我国天牛有害种类153种,分属于6亚科,主要内容有概述、形态特征、分类及寄主植物表等,每种天牛都有种征描述、地理分布、寄主植物及彩色全图,一部分种类并附有生活习性。

家父在1933年就和陈世骧共同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会议,是最早出席国际昆虫学大会的中国学者。20年后他们又在北京重逢,家父和他们夫妇在昆虫所和动物所共事30年,彼此知根知底。我知道他们在学术和处事上有共同点,但有时意见也不完全一致。陈伯母谢蕴真是个心直口快之人,家父很赞赏她这点。过去我们两家经常往来。作为我

的长辈,我对他们也很尊重,也很同情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他们夫妇比我父母去世都晚,但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年长于我,现应过70岁了。我出国后再没见过他们,希望以后回国能有机会叙叙旧。

三位姓氏声母为“L”的中国语言学大师

在中关村,我有幸与三位顶尖的中国语言学大师为邻,有趣的是他们的姓氏的声母均为“L”。他们分别是罗常培先生(Luo Changpei)、陆志韦先生(Lu Zhiwei)和吕叔湘先生(Lv Shuxiang)。而更巧的是,在英文单词中,语言(Language)、语言学(Linguistics)和语言学家(Linguist)也均以“L”字母开头。这不免让人产生联想:是否声母为“L”的姓氏更有机会成为语言学大师?这当然是玩笑了。

50年代时,中国科学院四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文学所、经济所、语言所和哲学所——在这四所的二层小楼都建好后,先后搬入中关村。这些所的很多家人也都随之搬来,其中罗常培先生住14楼,陆志韦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则入住15楼。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级研究员,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罗常培先生字莘田,号恬庵,满族,北京人。他生于1899年,1958年去世,只活了59岁,但他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十分巨大。老舍先生在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时,含着热泪写下了“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的诗句。他在《悼念罗常培先生》一文中写道:“莘田与我是小学的同学。自初识到今天已整整有五十年了!叫我怎能不哭呢?”^①

罗常培先生是19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历任西北大学、中山



○ 罗常培(1899~1958)

^① 引自老舍著《悼念罗常培先生》。